

※文哲論壇※

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初探

劉成群*

一、宋元時代徽州學界的《詩》學

在南宋時期，徽州學界的儒士中治《詩》的並不多，這跟《易》學遍地開花的盛況相比殊不相同。科舉取士，習經義者本經義三道，《詩經》不是徽州儒士科目興趣之所在，方回曾說：「吾州《詩》大比，舊不與選，回先君師四明舒公璘，禮部符許拔解，自先君慶元乙卯始。」¹「回先君琢，師事教授四明舒先生璘，長公〔呂午〕六歲，同經後先擢第。」²直到南宋末年，方琢才第一個以《詩經》擢第，呂午是第二個。研習《詩經》不能為科舉助益，這也應該是南宋徽州學界終未形成《詩經》研究風氣的原因之一。

整個南宋，徽州學界有名的《詩》學著作屈指可數。朱熹同時代的學者程大昌《考古編》中載〈詩論〉一卷；由宋入元的程直方著有〈學《詩》筆記〉³、程龍著有〈尚書毛詩二傳釋疑〉⁴，但像這樣的著作，總歸是不多。元代徽州學界的《詩經》學也是頗為寂寥，其中因有陳櫟的《詩經句解》、《詩大旨》、《讀詩記》⁵與胡一桂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青年專案「元代新安理學研究」(11CZS023)階段性成果。

* 劉成群，北京郵電大學民族教育學院副教授。

¹ [宋]方回：〈江東撫幹通直郎致仕汪公儀鳳墓誌銘〉，〔明〕程敏政輯撰：《新安文獻志》（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頁2393。

² 方回：〈呂公午家傳〉，《新安文獻志》，頁1923。

³ [元]董時父：〈前村程先生直方傳〉，《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6冊，頁224。

⁴ [元]程伯機：〈程公龍家傳〉，《新安文獻志》，頁2406。

⁵ [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6-7。

的《詩集傳附錄纂疏》以及汪克寬的《集傳音義會通》⁶（此書已佚）的點綴，尚不至於荒蕪，這些著作比起元代徽州學界大量湧現的《四書》學、《易》學、《春秋》學著作來，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陳櫟《詩經句解》、《詩大旨》、《讀詩記》，今均已佚，無法窺其規模，但陳櫟的《定字集》中還保留著一篇〈詩經句解序〉，這使我們還可以考察陳櫟的一些《詩》學觀念。《詩經句解》本是爲了訓蒙而作，這與他的《中庸口義》、《論語訓蒙口義》諸類著作也無多大區別。《詩經句解》又名爲《述傳句解》，因爲此書乃是「述文公之《傳》」而爲之句解的。

郝經在爲《詩集傳》所作的序中，歸結了朱子《詩》學的幾大貢獻，即：「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糞訓詁之弊，定章句、音韻之短長差舛，辨大、小《序》之重複。」⁷陳櫟《詩經句解》基本上也持相同看法，他也認同「〈風〉有正有變」、「〈雅〉之大小亦有正有變」；並且認爲《詩經》主旨，「大要不出美善、刺惡二者」。而且對朱子《詩序辨說》辯正《詩序》之舉，推崇備至，他認爲：

《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詩序》傳於世。今考《小序》與《詩》牴牾，臆度傳會、繆妄淺陋常多，有根據而得《詩》意者常少，其非孔子、子夏所作而爲宏所作，明矣。諸序本自合爲一編，至毛氏爲《詩》訓傳，始引序入經，分置各篇之首，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有不通，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附合，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敢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獨朱文公《詩傳》始去《小序》，別爲一編，序說之可信者取之，其繆妄者正之，而後學者知《小序》之非，聞正大之旨，至矣盡矣！⁸

陳櫟《詩經句解》中有關《詩經》「六義」的闡釋也與《詩集傳》高度保持一致，而且判斷《詩序》爲衛宏所作，亦因襲於朱熹的《詩序辨說》，可見此書「述文公之《傳》」名副其實。陳櫟《詩經句解》的教育對象是所謂「幼學」，語言訓釋相對而言，可能要簡單一些。而胡一桂的《詩集傳附錄纂疏》卻要繁複得多，因爲此書

⁶ [元] 吳國英：〈環谷汪先生克寬行狀〉，《新安文獻志》，頁 1770。

⁷ [元] 郝經：〈朱文公詩傳序〉，《全元文》，第 4 冊，頁 188。

⁸ [元] 陳櫟：〈詩經句解序〉，《全元文》，第 18 冊，頁 113。

的立意是要羽翼、補充《詩集傳》，是以在《詩集傳》的基礎上，又加入了「附錄」與「纂疏」，因而卷帙應該比《詩經句解》要浩繁得多。當然，無論是簡是繁，兩書在宗朱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

二、「附錄纂疏」體

胡一桂(1246-?)，字庭芳，徽州婺源人，元代新安理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生於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自幼穎悟，五、六歲開始讀書，十二、三歲而能寫文章。景定甲子(1264)十八歲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一桂居之前有二小湖，自號『雙湖居士』，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⁹。胡一桂以講學詁經為畢生追求，不問仕進。其著作有《易本義附錄纂疏》、《易學啓蒙翼傳》、《詩集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古今通要》、《人倫事鑒》、《歷代編年》等，並有《雙湖先生文集》傳世。胡斗元曾稱讚其「明經道脈垂方策，玩《易》工夫載簡編」¹⁰。正是針對其詁經而言，其推崇亦可見之一斑。

《詩集傳附錄纂疏》一書在元泰定四年(1327)初刻於建安東陽的翠巖劉氏家塾。當時劉氏家塾把六卷本的《韓魯齊三家詩考》附在二十卷本的《詩集傳附錄纂疏》之後，一併刻出，家塾主人劉君佐在此刻本上跋有題識：

文場取士，《詩》以朱子《集傳》為主，明經也；新安胡氏編入《附錄纂疏》，羽翼朱《傳》也；增以浚儀王內翰《韓魯齊三家詩考》，求無遺也。今以《詩考》謹鈹諸梓，附於《集傳》之後，合而行之。學《詩》之士潛心披玩，蜚英聲於場屋者，當自此得之。¹¹

可見劉君佐刻此文稿的意圖乃是為科舉計，而揭傒斯族父、詩人揭祐民卻更從學術的角度看待此刻本，他在為《詩集傳附錄纂疏》所寫的序言中說道：

近世《詩》解甚多，如李迂仲、呂伯恭皆善言，惟華谷嚴氏能詣風、賦、比、興之趣，識其正體，其間援朱子言者多，是知朱《傳》不得不為《詩》之統

⁹ [元]汪幼鳳：〈胡玉齋方平傳〉，《新安文獻志》，頁1725。

¹⁰ [元]胡斗元：〈送庭芳回梅溪二首〉，[元]胡一桂：《雙湖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322冊，頁575。

¹¹ [元]劉君佐：〈詩集傳附錄纂疏刻書識語〉，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7冊，頁284。

宗會元，雖聖人復出，不易斯言也。然則今胡氏之《附錄纂疏》及稽《齊魯韓三家詩考》，摭摭星宿於羲娥後，得無戾朱子意乎？曰：不然，漢儒自申、轅而下，專門者絕力模倣，皆為羽翼聖經，獨如支流未底于海，習射之未至于的，則各有見焉。今之纂集大成，彙括前後，鍜剔眾說，學者得之，如大庖饜飫，不但染指嘗鼎。胡氏之心豈弗良苦？觀其精力茲書，殫身乃已。¹²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揭祐民所要表達的幾個意思，首先是認同朱熹《詩集傳》的集大成地位；其次是認為《詩集傳附錄纂疏》「彙括前後，鍜剔眾說」，各種材料補充得極其充分，使學者能夠輕鬆窺得歷代學者的心得見解。再有一點就是，談及此次刊刻《詩集傳附錄纂疏》乃是與《韓魯齊三家詩考》合刊。

胡一桂亦出身於婺源之《易》學世家。胡一桂的曾祖胡溢，與朱熹有世好之誼¹³。父親為胡方平，號玉齋，早受《易》於董介軒，繼師沈貴瑤。董介軒夢程為黃幹弟子，曾受朱熹之《易》於黃幹，同時董夢程亦為董銖從子，得其家傳。而董銖乃是跟從朱熹學《易》最久的一位學者，所以《元史·儒學傳》稱：「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¹⁴

朱熹早年所作《詩集解》對《小序》還是持肯定態度，後受鄭樵影響，「知《詩序》之果不足信」。於是將《大序》、《小序》並為一編，定名為《詩序辨說》。《詩序辨說》出，朱子學者即以為不刊之論，向以宗朱著稱的新安理學家們，更是敬之若神。對朱熹《詩序辨說》，陳櫟即以「至矣盡矣」來形容，胡一桂則非常細緻地為《詩序辨說》作了「附錄」和「纂疏」，並鄭重地置於《詩集傳附錄纂疏》一編的篇首，其尊崇意味可見一斑。

胡一桂著有《易本義附錄纂疏》，《四庫全書》著錄。四庫館臣對其體例所為提要云：「是編以朱子《本義》為宗，取《文集》、《語錄》之及於《易》者附之，謂之『附錄』。取諸儒《易》說之合於《本義》者纂之，謂之『纂疏』。其去取別裁，惟以朱子為斷。」¹⁵《詩集傳附錄纂疏》的體例與《易本義附錄纂疏》完全一致。所謂「附錄」，也是將朱熹《文集》和《語錄》中涉及《詩經》的內容，附在《詩

¹² [元]揭祐民：〈朱子詩傳纂集大成序〉，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7冊，頁275-276。

¹³ 汪幼鳳：〈胡玉齋方平傳〉，《新安文獻志》，頁1723。

¹⁴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4冊，卷189，頁4315。

¹⁵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上冊，頁22。

集傳》正文之後。在解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時，朱熹引出他自己對「興」這一概念的理解：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¹⁶

胡一桂惟恐初學者一時間不能參詳透徹，故又引《朱子語類》中論「興」的兩段文字附錄於其下：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卻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個物事貼一個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實事。

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苜蓿是潔而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他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¹⁷

如此一來，便使初學者更易於理解。胡一桂對《朱子語類》中那些通俗、明白、曉暢的解釋似乎格外重視，為此，他還特意從《朱子語類》中選摘出專門論《詩》的文字編纂為一卷《語錄輯要》，放在書首的《詩傳綱領》之後，《詩序辯正》之前。

按照《詩集傳附錄纂疏》的體例，正文乃是《詩集傳》原文，其次是「附錄」，再次則是「纂疏」。「纂疏」即是取諸儒有關《詩經》的文字，只要其不與《詩集傳》相悖，則可纂之於「附錄」之後，以「纂疏」二字標記之。譬如有關〈周南〉裏的〈麟之趾〉一篇，胡一桂纂疏曰：

陸氏曰：「麟，色黃，圓蹄；不群居，不侶行；不經陷阱，不罹網羅。王者至仁乃出。」餘見《集傳》。嚴氏曰：「公子指周南國君之子。」疊山謝氏曰：「麟之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詠其一身之間，可貴也。一章曰趾，二章曰定，三章曰角，自下而至於上也。」¹⁸

這裏的陸氏、嚴氏、疊山謝氏分別是指陸德明、嚴粲與謝枋得，釋文分別出自陸德

¹⁶ [宋]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1-2。

¹⁷ 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7冊，頁314。

¹⁸ 同前註，頁318。

明的《經典釋文》、嚴粲的《詩緝》與謝枋得的《詩傳注疏》。胡一桂纂疏《詩集傳》可以說做到了博採眾長，他在《纂疏》中徵引的文獻材料十分豐富，所徵引之儒家學者達四十六人之多，從大、小毛公到鄭玄到孔穎達，再到歐陽修、程頤、呂祖謙，一直到他的好朋友熊禾那裏。而且胡一桂編纂此書也沒有太多門戶之見，像王安石、蘇軾、陸佃、陳傅良等，向為朱子學者所詬病的學者的見解，只要能對《詩集傳》有所助益，他都能做到為我所用，體現出兼容並蓄的精神。

朱熹所強調的「格物致知」是一種由外及內的體驗過程，即通過外界的格物，進而認識「理」。在朱熹那裏，讀書博學（格物的重要內容）與專事義理是並行不悖的連貫過程。但是博學的風氣常常會導致專事讀書，而流為訓詁之學，如全祖望〈澤山書院記〉所云：「朱徽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峰、北溪諸子，流入訓詁一派。」¹⁹朱熹身後，其後學尚留有一定的學術空間，首先是其徒子徒孫對朱子遺文和講學遺言的編輯整理工作。這項工作到南宋末葉就完成了，於是朱子學者的研究興趣，轉向對《四書集注》以及《五經》之學的集釋上來。他們集釋的原則是羽翼朱子經學，這就是「附錄纂疏」體以及「句解」體出現的歷史語境。

元初的新安理學家們，如胡一桂、陳櫟、胡炳文等人，普遍流於經纂、訓釋、句解。相對而言，他們的學術在一定程度上比較瑣碎與支離，以致非常容易陷入「博而不能返約」的泥淖當中。陷入這泥淖中的新安理學，必然會走向一定程度的僵化、呆滯，極有可能失去自我更新、自我突破的機能。

但時局卻峰迴路轉，元仁宗時期，科舉的舉行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陷入困境的新安理學。元代官方尊崇朱學，科舉考試基本上是以朱熹的學術為標準。這一點從皇慶二年開科取士的詔令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使得新安理學以宗朱為主旨的經纂、訓釋之學恰好派上用場。劉氏家塾主人劉君佐刊刻《詩集傳附錄纂疏》的目的正是為科舉計。科舉的舉行對朱子經學來說是幸運；但也暗含著不幸，因為科舉更容易使原本具有診斷性與批判意識的思想探求，演變為考察記憶力的競賽。很多士人為了功名利祿，採取了非常現實性的應對方法，他們其中很多人唯知死記硬背，至於性理之學的深層內涵則全不理會。於是整個社會的學術氛圍，益發偏於言語訓釋之末。這使得朱子經學面臨著更大的挑戰。如朱升云：

¹⁹〔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中冊，頁1054。

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反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脈不通，首尾不應。²⁰

「斷裂其經文」是科舉發展的必然趨勢。在元代中期的徽州學界，胡一桂等人所宣導的「附錄纂疏」之學在一定程度上，也進入了「博而不能返約」或「斷裂其經文」的死胡同。胡一桂、陳櫟、胡炳文以後，以朱升、鄭玉、趙汭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學家開始尋求突破，從而使新安理學出現了「和會朱、陸」的轉向。朱升經學研究以「求真知」為宗旨，以「旁注」為手段，用「尊德性」來統攝「道問學」²¹。鄭玉力倡朱、陸之同，並把陸學引入了《易》學研究，認為：「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人物一《易》也，吾身亦一《易》也。」趙汭則認為朱、陸「早異晚同」，其《春秋》學研究，擺脫有宋以來空言說經之傾向，積思自悟，以「屬辭比事」為《春秋》之法，容納古今經注，直探聖人本旨。可見元朝新一代的新安理學家，在經學研究上已經有了新的動向與新的追求，他們已經著力在糾正前輩學者偏執於經纂、訓釋、句解的流弊，「附錄纂疏」體及「句解」體逐漸淡出了他們的學術視野。

《詩集傳附錄纂疏》雖被刊刻者宣傳為對科考舉子多有裨益，但此書在當時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其流布不是很廣。當明代永樂年間，胡廣等人纂《四書五經大全》，其中《詩經大全》以劉瑾《詩傳通釋》為底本，《詩集傳附錄纂疏》邊緣化的徵兆已然出現。《詩經大全》編成以後，並憑藉皇權，在有明一代確立了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其他的《詩經》學著作就漸漸瀕於零落之境，這也是時代所使然。

錢大昕曾在寶川朱寄園家中見到了《詩集傳附錄纂疏》，讚歎云：「是誠世間難得之本矣。」²² 瞿鏞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中談及《詩集傳附錄纂疏》的流布情況時，也說道：

雙湖所著《易本義附錄纂疏》、《易學》（《元史》作《本義》）、《啓蒙翼傳》，已皆著錄《四庫》，此書流傳絕稀，未經采進。朱氏《經義考》、錢氏《補元史藝文志》俱作八卷，朱氏又倒其名為《纂疏附錄》，蓋皆承黃氏《千頃堂書目》之訛。²³

²⁰ [明] 朱同：〈朱學士升傳〉，《新安文獻志》，頁 1856。

²¹ [明] 朱升撰，劉尚桓校注：《朱楓林集》（合肥：黃山書社，1992 年），頁 44。

²²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 年），頁 291。

²³ [清]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71。

可見，到了清代的時侯，胡一桂的《詩集傳附錄纂疏》刊本已經變得相當罕見了。

三、《詩》學的考據學轉向

趙汭在談及元代新安理學時曾說：「其學所本，則一以郡先師子朱子爲歸。凡六經傳注、諸子百氏之書，非經朱子論定者，父兄不以爲教、子弟不以爲學也。是以朱子之學雖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新安之士爲然。」²⁴ 新安經學普遍流於經纂、訓釋、句解，以羽翼朱子爲指歸，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自不例外；但若仔細研讀此書，卻又能發現此書非同一般的羽翼朱子的經纂、訓釋、句解之作，尤其是在某些方面，偏離了朱子經學，體現出一些獨特的解經傾向。

朱熹《詩集傳》的面世，把《詩經》學的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弟子們面對這部博大深厚的作品，唯有景仰，以至於謹守所聞，不越雷池一步。譬如其弟子輔廣著《詩童子問》述平日聞於朱子之說，以羽翼《詩集傳》，此書謹守師說，訓詁考證則失之疏舛。朱熹經學的闡釋學思路是義理與訓詁並重，朱熹義理無論在體系上，還是在規模上，都博大精深，極具籠罩性，若想更進一步，當然難比蜀道。後輩朱子學者若想取得些許造詣，從訓詁考證上進一步增益朱子之學，或糾朱子之偏，則不失爲一條路徑。況且朱子後學如輔廣者，本就存在著不少的訓詁舛訛，竟不知「『季春薦鮪』爲〈月令〉之文，誤以爲《序》說而辨之」²⁵。這就越發使得朱子經學發生了一種考據學的轉向。具體到《詩》學而言，宋末王應麟的《詩》學研究已經很明顯地顯示出這種考據學的轉向。

王應麟曾指出：

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帙，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考於斯。²⁶

三家《詩》輯佚之學即肇端於王應麟《詩考》。胡一桂對王應麟所撰《韓魯齊三家詩考》頗爲推崇，劉君佐泰定刻本將《詩集傳附錄纂疏》與《韓魯齊三家詩考》合

²⁴ [元] 趙汭：〈商山書院學田記〉，《全元文》，第 54 冊，頁 515。

²⁵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頁 131。

²⁶ [宋] 王應麟：《詩考序》，《詩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1。

刊，也可以說是胡一桂與王應麟緣分之所在了。早在元延祐元年甲寅(1314)秋，胡一桂就曾為《韓魯齊三家詩考》作序云：「毛氏之於三家最為後出，安有《小序》三家不得之於前而毛氏乃得之於其後也？讀者尚有以考斯。」²⁷對王應麟《詩》學予以高度評價。夏傳才在談到王應麟《詩》學時，列舉了三條貢獻，其一是上文所提及的三家《詩》輯佚之學，其二與其三分別是「搜集《詩經》正文的異字異義及未編進《詩經》的逸詩，附在《詩考》書後，開闢《詩經》譯文校勘工作」、「著《詩地理考》(六卷)，對《詩經》中的地名，博采古籍，考證研究，說明它們的山川形勢，疆域沿革，風土民情，薈萃成篇」²⁸。可以說王應麟的《詩》學研究走的是一種考據學的路線。這種考據學路線對於向來傾慕王應麟的胡一桂來說，其影響不言而喻。

胡一桂對《詩集傳》的纂疏也順遂了王應麟《詩》學的研究路徑，從訓詁考證上為《詩集傳》進一步增益。胡一桂文獻掌握相當豐富，訓詁能力也非常高，這也正是元代新安理學家們的學術特色。紮實的文獻、訓詁能力使得胡一桂能提出一些獨立的見解。《詩集傳附錄纂疏》雖以「附錄」、「纂疏」為體，但並未對朱熹的闡釋百分百地亦步亦趨，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云：「其朱說有未安者，間亦參通他說。如云『諸家皆本《序》說，姑纂一二』(〈采葛〉)，或云『姑備諸說』(〈丘中有麻〉)，或云『姑備參考』(〈甫田〉)，或云『備說《詩》者覽焉』(〈有女同車〉)。蓋雖不敢顯違朱子，而亦隱示不墨守朱子也。」²⁹可以試舉一例，如關於〈周南〉裏的〈汝墳〉一篇，朱熹《詩集傳》注解云：

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頰，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獨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

²⁷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頁104。

²⁸ 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年)，頁152。

²⁹ 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46。

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³⁰

對於朱熹的這一說法，胡一桂認為朱熹還是沒有盡去《小序》的影響，有點牽強解釋以求合於《小序》的意味。因此他在此段纂疏之下加了按語，以更加詳盡的訓詁依據，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理解：

愚按：此章說者皆就「魴魚頰尾」上，說婦人閔其夫行役之勞，「王室如燬」以下，說婦人勉其夫以正。恐不但以《小序》說《詩》，反成以《詩》說《小序》，此先生去《小序》而未盡也。竊謂詩人自說「魴魚頰尾」，以興「王室如燬」一句，若曰魴魚則頰尾矣，王室則如燬矣，「頰」與「燬」二字相應。又曰：雖則如燬，而文王之爲我父母，則甚適也，豈婦人見其夫之歸而相與慰勞之辭乎？詩意不過如此，「魴魚頰尾」，何預行役之勞事？而必欲強解以求合《序》，可乎？魴魚尾本赤，不必言勞而後赤。按李氏引《說文》及《字林》，皆曰：「魴，赤尾魚。」又引晉安《海物記》曰：「橘鬣魚，猶今魴魚，尾赤，鬣似橘。」且曰：「觀此數說，其實言尾本赤也。」³¹

這樣的獨立見解在《詩集傳附錄纂疏》中並不少見，詳見下表：

《詩經》	目錄	「纂疏」 數目	「纂疏」中胡一桂的獨立見 解（「愚案」、「愚謂」）	「復纂用《序》說」的篇目
風	周南	23	「流」、「卷耳」、「南有樛木」、「頰尾」等，共4條。	
	召南	28	「室家不足」、「舒」、「騶虞」等，共3條。	
	邶風	53	「柏舟」、「于嗟闊兮」、「睨睨」、「士如歸」、「匏有苦葉」、「衛女思」、「彤管有煒」、「不瑕有害」等，共8條。	匏有苦葉
	鄘風	18		

³⁰ 朱熹：《詩集傳》，頁7。

³¹ 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7冊，頁317-318。

	衛風	24	「反是不思」、「誰適爲容」、「投我以木瓜」等，共3條。	
	王風	20		采葛、丘中有麻
	鄭風	37	「仲可懷也」共1條。	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蘄兮、狡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
	齊風	27		甫田
	魏風	18	「汾沮洳」共1條。	
	唐風	25	「不敢以告人」、「羔裘」、「歸於其居」等，共3條。	山有樞、杖杜
	秦風	24	「蒹葭」、「終南」、「黃鳥」等，共3條。	晨風
	陳風	23	「澤陂」共1條。	宛丘、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墓門、防有鵲巢
	檜風	10	「棘人」共1條。	隰有萋楚
	曹風	15		
	豳風	18	「改歲」、「乘屋」、「豳風」、「伐柯」、「狼跋」等，共5條。	
雅	鹿鳴之什	44		
	白華之什	20		
	彤弓之什	33	「甫草」共1條。	鴻雁、沔水
	祈父之什	58	「謂山蓋卑」、「燎」、「無棄爾輔」、「魚在於沼」、「彼有旨酒」、「十月之交」、「哀哉不能言」等，共7條。	

	小旻之什	55		小宛
	北山之什	35	「甫田」共 1 條。	
	桑扈之什	28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鴛鴦」等，共 3 條。	
	都人士之什	29	「箕星」共 1 條。	漸漸之石
	文王之什	63	「侯于周服」、「棗之夙夙」、「應門」、「上帝耆之」、「王季之心」、「帝謂文王」、「侵自阮疆」、「言言」、「豐水」等，共 9 條。	
	生民之什	53	「腓」、「其胤維何」、「率由群匹」等，共 3 條。	
	蕩之什	88	「強禦」、「抑」、「天不我將」、「天降喪亂」、「民之未戾」、「崧高」、「爛其盈門」、「作召公考」、「既敬既戒」、「鞠人」等，共 10 條。	
頌	周頌・清廟之什	19	「清廟」、「不顯」等，共 2 條。	
	周頌・臣工之什	13	「豐年」、「簫管備舉」等，共 2 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20	「訪予落止」、「敬之敬之」等，共 2 條。	
	魯頌	24	「泮水」、「路寢孔碩」等，共 2 條。	
	商頌	27	「嗟嗟烈祖」共 1 條。	

從表格中可以看出，胡一桂所持獨立見解的條目計七十七條，在九七二條「纂疏」中所占有的比例在 7.92% 左右。胡一桂的《詩》學研究以朱熹為宗，以王應麟為法，在「纂疏」這種體裁中，胡一桂遵循了王應麟的考據學方向，從而提出了諸多獨特見解，7.92% 的比例已經頗能顯示出胡一桂不墨守朱子《詩集傳》的基本動向了。

其實在有元一代的《詩經》學研究中，不墨守朱子《詩集傳》是一個普遍現象，如梁益《詩傳旁通》在音韻學層面對《詩集傳》有較多的訂正。劉玉汝同樣也因音韻而與朱熹持不同見解，尤其反對其「叶音說」。朱公遷《詩經疏義》與羅復《詩集傳名物鈔音釋纂輯》在釋義與音韻上都對《詩集傳》進行了一定的修訂³²。堪稱為元代《詩》學佼佼者的劉瑾，其著作《詩傳通釋》雖以羽翼《詩集傳》為旨，對朱熹的訓釋倍加回護³³，但有時也以一種考據學的研究，對朱熹的學說提出不同的看法，如〈小雅·菁菁者莪〉一篇中的「錫我百朋」，朱熹釋「朋」曰：「古者貨貝，五貝為朋。」³⁴劉瑾卻提出了訂正意見，他認為：

孔氏曰：《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為朋者，謂小貝以上四貝，各二貝為一朋，而成者不為朋。³⁵

元代《詩經》學者雖以宗《詩集傳》為主流，但他們也不避諱公開指摘朱熹的誤訓。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雖也不墨守朱子，但是做得非常隱晦。這大概與元代新安理學家「一以朱子為宗」的集體風氣有關。元代整體的經學研究還是存在多元取向的，並不是像新安理學家這個地域學派那樣近乎狂熱地宗朱，這一點從延祐開科時議定的科舉條例中也可參詳一二，如「《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³⁶。正如四庫館臣在王充耘《書義矜式》的提要中所說的：「考《元史·選舉志》載《書》用蔡《傳》及注疏。當時經義，猶不盡廢舊說，故應試者得兼用之。此元代經學所以終勝明代也。」³⁷

皮錫瑞也認為「元以宋儒之書取士，《禮記》猶存鄭注」，但是「明並此而去之」，

³² 程嫩生：〈元代詩經學芻議〉，《中州學刊》，2008年第4期，頁217。

³³ 如陳啓源撰《毛詩稽古編》，就對劉瑾遷就朱熹之誤多所駁詰。〔清〕陳啓源：《毛詩稽古編》，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5冊，頁427。

³⁴ 朱熹：《詩集傳》，頁114。

³⁵ 〔元〕劉瑾：《詩傳通釋》，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76冊，頁519。

³⁶ 宋濂等：《元史》，第7冊，卷31，頁2019。

³⁷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頁105-106。

使學者全不覩古義」，以至於「譏陋為尤甚」³⁸。他以為元代經學高過明代的原因即是猶存古義。在胡一桂經學研究中可以看到這一特點，即雖以朱子是宗，但古注疏仍可用來斟酌朱子的某些結論。如為了扭轉「專主理義」的傾向，胡一桂的《易》學研究明顯加重了用象來闡《易》的傾向。甚至他為了以象解《易》，又重新抬出被朱熹目之為牽合附會的〈說卦〉。關於胡一桂的《易》學，此不贅言。總之，王應麟、胡一桂等學者以考據學為手段，調動古注疏，發揮新見解，從而為朱子經學的嚴密性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四、嚴粲《詩》學的影響： 「《詩》即史」及「復纂用《序》說」

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的「纂疏」之中，以引用嚴粲的《詩緝》、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與謝枋得的《詩傳注疏》為最多。以〈周南〉、〈召南〉為例，兩章「纂疏」之中引用嚴粲的《詩緝》十六條、陸德明的《經典釋文》九條、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五條、謝枋得《詩傳注疏》四條。

嚴粲《詩緝》本因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而作，四庫館臣曰：「是書以呂祖謙《讀詩記》為主，而雜采諸說以發明之。」³⁹雖然兩書體例有別，但卻存在很多共同的地方，如均仍遵信《毛傳》，對於音訓、名物也都考證精核。兩書還有一個共同的觀念，即在一定程度上都持有「《詩》即史」的觀念。呂祖謙曾說：「看《詩》即是史，史乃是事實。如《詩》甚是有精神，抑揚高下，吟詠諷道，當時事情，可想而知。」⁴⁰嚴粲亦曰：「然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⁴¹《詩緝》在後世影響很大，尤其是嚴粲《詩緝》最受推崇，所謂：「宋人治《詩》之集其成者，無逾嚴粲《詩緝》，實能熔鑄漢、唐舊義，兼錄時人說《詩》之意，無適無莫，實事求是，揆諸先民吟詠之旨，最為近之。余教學者治《詩》，必以嚴書為

³⁸ [清]皮錫瑞著，周予同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89。

³⁹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頁133。

⁴⁰ [宋]呂祖謙：《雜說》，《東萊呂太史別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續金華叢書》本），卷5，頁136。

⁴¹ [宋]嚴粲：《詩緝》，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75冊，頁363。

守約之編焉。」⁴²

受到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嚴粲《詩緝》的影響，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在一定程度顯示出「《詩》即史」的解讀取向。譬如〈邶風·擊鼓〉一篇，朱熹認為：「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⁴³朱熹說《詩》，其追求的乃是經典的神聖意義，對於《詩》與史的關係則持審慎態度，「恐或然也」一語即是明證。胡一桂卻在《詩》學研究中常常直接把《詩》與史掛鉤，同是〈邶風·擊鼓〉一詩，他加按語說：

愚按：魯隱公四年三月，州吁弑桓公自立。夏，將復先君之怨於鄭，以求寵於諸侯。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宋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遂從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九月，如陳見殺。今《詩》言南行者，伐鄭也乎！陳與宋者，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其後兵出未嘗敗北，是詩蓋士卒將行，與室家訣別之辭，預憂其不我以歸，恐於彼居處，於彼喪馬，若來求我，則於林下，因念初婚盟誓，今不得遂其相契相生之志，不得伸其偕老之願也。⁴⁴

在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胡一桂是有意地加強了《詩》、史連帶關係。胡一桂著有《十七史纂古今通要》、《人倫事鑒》、《歷代編年》，他是一位史家，有比較深厚的史學素養。瞿鏞談起胡一桂《詩》、史糾葛時，就曾說過：

至自下己意，則加「愚案」、「愚謂」以別之。蓋雖宗《集傳》，亦自具識解。如〈鄭風〉諸詩，兼存《序》說，其論〈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在魯文公時。〈閟宮〉新廟，即僖公廟，作泮宮，克淮夷，是僖公實事，非頌禱之辭。〈魯頌〉正可補《春秋》之闕，尤為卓識。⁴⁵

呂祖謙《詩》學仍是守《序》說，不廢毛、鄭的，嚴粲也繼承了這一思路。受到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嚴粲《詩緝》的影響，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在一定程度顯示出「復纂用《序》說」的解讀取向。在《詩集傳附錄纂疏》中，胡一桂雖也曾指出朱熹存在去「《小序》而未盡也」的缺欠，但是他卻常常有回歸到《小序》的動向。譬如有關〈鄭風〉中的〈有女同車〉一詩，本屬男女相悅之歌，與史事無

⁴² 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卷1，頁30-31。

⁴³ 朱熹：《詩集傳》，頁18。

⁴⁴ 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7冊，頁326。

⁴⁵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頁71-72。

關，《小序》卻以為此詩「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朱熹《詩集傳》破除了《小序》這種牽強的史事附會，認為「此疑亦淫奔之詩」⁴⁶。雖然朱熹也戴有道學家的有色眼鏡，大斥〈鄭風〉多「為女惑男之語」，但這種「淫詩說」破除牽強附會的《小序》迷信，在《詩經》學史上有其進步意義⁴⁷。然而胡一桂卻認為諸家如毛公、呂祖謙、嚴粲等多用《小序》的說法，他在此篇中也「復纂用《序》說」⁴⁸。〈鄭風〉中的一些詩篇如〈山有扶蘇〉、〈摯兮〉、〈狡童〉、〈褰裳〉、〈風雨〉、〈子衿〉等，如〈有女同車〉一樣，都被朱熹斥為淫詩，胡一桂卻以「諸家多用《序》說」遮掩自己不同於朱熹的立場，閃爍其辭地擺出自己的見解。

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中「《詩》即史」及「復纂用《序》說」這兩種傾向，可以說直接與嚴粲《詩緝》垂範相關。嚴粲在文學層面是一位江湖詩人，在《詩》學研究層面，他又秉承「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⁴⁹的東萊之學，可見嚴粲並不是嚴肅意義上的朱子學者。胡一桂吸收其學術理念以纂疏朱子《詩》學，則顯示出一定的相容性與開放性。

五、謝枋得的影響與「夷夏之辨」

謝枋得(1226-1289)，字君直，號疊山。德祐元年(1275)，曾以江東提刑、江西詔諭使知信州。宋亡，寓居閩中。後受脅迫至大都，絕食而死。

謝枋得是宋末著名學者、文章大家，又是與文天祥齊名的忠臣義士，胡一桂自然對其十分尊崇，在其壯年時就曾有書信寫給謝枋得，表述心跡，信裏有「郊廓之鼎已易」之句，顯然是以亡宋為正統。並感慨曰：「事蓋有大謬不然者，我之為我，亦無復有志於斯世矣。」⁵⁰從信中可以看出胡一桂對於宋、元易鼎的憤慨，並流露

⁴⁶ 朱熹：《詩集傳》，頁52。

⁴⁷ 如黃雅琦在〈朱熹淫詩說在詮釋學上的意義〉一文中就說：「朱熹『淫詩說』之難能可貴，在於他棄置《小序》成說，破掃了千古以來因『聖人讀者中心論』所造成的文本解讀的迷障。」黃雅琦：〈朱熹淫詩說在詮釋學上的意義〉，《詩經研究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第13輯，頁211。

⁴⁸ 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7冊，頁348。

⁴⁹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冊，卷51，頁1653。

⁵⁰ 胡一桂：〈上謝疊山先生求作翼傳序書〉，《雙湖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22冊，

出相當失望的意緒。入元後，他退而講學，以講學詁經爲畢生追求，不問仕進。

在風骨氣節這一人格層面，胡一桂無疑是以謝枋得爲人倫風範。在學術層面，前者受後者的影響也是自然而然。謝枋得著有《詩傳注疏》一書，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引用頗多。《詩傳注疏》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是多闡發黍離之悲，作者遺民心志顯露無遺。尤其此書充斥的「夷夏之辨」以及「復仇」的內容，也都被胡一桂一一徵引在「纂疏」之中，譬如關於〈王風·黍離〉一詩，胡一桂引謝語曰：

天王而沒於夷狄，天地之大變，中國之大恥，東周臣民之大仇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爲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惻於中乎？吾讀《書》至〈文侯之命〉，……所以訓誡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文、武、成、康在天之靈必不樂矣。……吾觀十二〈國風〉群臣庶民無一人知天下大義。「王於興師，與子同仇」，獨〈無衣〉一詩猶有義氣，不知斯人何以生於秦也？秦人猶能以天王之仇爲天下之同仇，平王不能以厥考之怨爲一己之私怨。人之度量相越如是哉？吾於〈黍離〉、〈無衣〉二詩，重有感也夫。⁵¹

又如〈秦風·無衣〉一詩，胡一桂引謝語曰：

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仇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仇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秦國何人所作，千載而下聞其風莫不起，況親炙其人乎？⁵²

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如此著力於「夷夏之辨」，這在元代《詩經》學界並非特例。張宏生在〈元代《詩經》學初論〉一文中，總結了元人《詩經》研究的五點認識，其中有一條就是對於歷代注家關於《詩經》中若干篇章進行「夷夏之辨」的申說，元人研《詩》並不避諱此論，甚至做了進一步發揮。張宏生的論點以多個例證爲支撐，譬如他就用劉瑾《詩傳通釋》中「戎狄之侵」和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

頁 569。

⁵¹ 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57 冊，頁 342。

⁵² 同前註，頁 366。

中「夷狄侵中國」的引述，證明自己的觀點。他進一步認為元代經師們「在研《詩》時融入了故國之思，而元朝並無像清朝那樣的嚴酷的思想文化控制」⁵³。

受謝枋得影響，胡一桂於「夷夏之辨」格外重視，在其學術研究中一再申述，甚至每每提及，都帶有泣血的沉痛。這些內容不僅僅出現在他的《詩集傳附錄纂疏》中，其他著作也並不少見，如他在《史纂通要》寫道：

胡劉淵、羯石勒、氐苻堅、羌姚弋仲、鮮卑慕容垂爭承其弊，剖裂中原，薶鹽生民，積骸成丘，流血成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⁵⁴

當然，謝枋得面對中原陸沉之情狀，也自覺無力回天。在沉痛之餘，他還是抱有一種以夏變夷，立經陳紀的希望。如他所言：

中國天理之聚，中國而純乎人欲，能化爲夷狄。夷狄人欲之聚，夷狄而有知天理，能化爲中國。秦本戎俗，不齒於中國之會盟，春秋，夷之邑於岐、豐，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無衣〉則知有夫婦之天，〈蒹葭〉則知有人心禮義之天……⁵⁵

胡一桂把謝枋得此語也引進了自己的「纂疏」裏。而且在他入元之後的人生軌跡裏，也帶有這一理想的印記。宋、元鼎革以來，宋儒的「外王」之學中的「得君行道」層面，亦即政治秩序的清理，基本是喪失了。「教民化俗」——有關朱子學經典的通俗化、禮制的推行以及學校教化——屬於下層秩序的整頓，並沒有停滯。胡一桂等新安理學家，以經師、山長、塾師身分，隱於徽州萬山之間，頹然白髮，以窮極群經爲畢生追求。在他們心中，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成爲他們自覺碌碌無爲的生命中的精神避難所。

綜上，《詩經》在宋、元兩個時代都不爲新安理學家們所重，治《詩經》的學者比較少，而且有名的《詩經》學著作也甚稀。陳櫟《詩經句解》與胡一桂的《詩集傳附錄纂疏》的著成，則彰顯了元代新安理學家們在這一學術領域的立場。《詩集傳附錄纂疏》雖然以「附錄」、「纂疏」爲體裁，對朱熹《詩集傳》大有羽翼之功，但並非一味墨守朱子者，其以古義增益朱子之學或糾朱子之偏，展示出崇尚考據學

⁵³ 張宏生：〈元代詩經學初論〉，收入楊晉龍主編：《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下冊，頁468。

⁵⁴ 胡一桂：〈史纂通要〉，《雙湖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22冊，頁607。

⁵⁵ 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7冊，頁362。

的風氣。同時受嚴粲《詩》學的影響，胡一桂的《詩》學研究也體現出「《詩》即史」及「復纂用《序》說」的傾向。再有，元代經師們在研《詩》時常常以闡發「夷夏之辨」寄託故國之思，這一特點在《詩集傳附錄纂疏》也有比較明顯的體現。

徵引書目

- 王應麟：《詩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 永 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全祖望：《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朱 升：《朱楓林集》，合肥：黃山書社，1992年。
- 朱 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 呂祖謙：《雜說》，《東萊呂太史別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續金華叢書》本。
- 宋 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46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4年。
- 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續修四庫全書》第5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_____：《雙湖先生文集》，《續四庫全書》第13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年。
-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
-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
- 程嫩生：〈元代詩經學芻議〉，《中州學刊》2008年第4期。
- 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黃雅琦：〈朱熹淫詩說在詮釋學上的意義〉，《詩經研究叢刊》第13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
- 楊晉龍主編：《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
- 劉 瑾：《詩傳通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1983年。

——：《補元史藝文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瞿 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嚴 粲：《詩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